

巴布教徒的起义与 阿密尔·尼扎姆的改革*

[苏]伊凡诺夫著,李希泌等译

人民的抗议与怨恨终于在反对国王与诸汗统治的自发暴动中得到发泄。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伊朗各市、各州这样的暴动爆发的越来越多。例如,在1847年手工业者、小商人与城市贫民在津章起义,反对该地州长,将州长驱逐出城。在同一年内,伊斯法罕的城市贫民发生骚动。1848年,在大不里士、伊斯得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城市贫民与手工业者的骚动与起义。

这些发动与起义的领导角色都是巴布教派,该教派创始者——巴布的信徒。伊朗的宗教派别就在以前也往往是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思想上的反映(例如,马资达克教、胡尔拉米特教等)。

巴布的真名为阿里·穆罕默德。1820年,巴布生于设拉子的一个棉布商人赛义德的家庭里。到了成年以后,他自己在班达布什尔经商有五年之久。后来,他往卡巴拉与纳哲夫朝圣。在那里,他成了赛希特教派的领导者,即赛义德·卡节姆·勒什特的徒弟。赛希特教派宣扬的主要思想是说伊斯兰教救世主——第十二世教长马赫底即将降临的思想。据传说,他消逝了已近千年,往后他还要出现,消灭大地上不平之事,并建立合理的新制度。

1843年赛希特教徒的领导者赛义德·卡节姆逝世,但未指定自己身后谁应继承。1844年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自称巴布,巴布就是人民渴望的马赫底表达自己的意志给人民所必由的津梁和门户的意思。到了1847年巴布就自称为先知马赫底了,写了一本《默示录》(*The Bayán*),在该书中叙述了他的教义的主要原理。《默示录》是巴布仿可兰经写的,巴布教徒奉为圣经。巴布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依次递嬗互代而发展的。每一个后来的时代越过前时代而与之不同。每一时代有该时代的特殊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由于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来临而废除,而代以新的制度。人们自己是不能独自制定新制度与新法律的。主宰通过先知来制定,他在每一时代派给人们一位先知。先知授给人们的指示,是为新的圣经,它就取旧圣经的地位而代之了。摩西及其旧约书、耶稣及其福音书、穆罕默德及其可兰经,按照巴布的意见,就是一个先知及其圣经和另一个先知及其圣经依次递嬗互代。

巴布教导说:穆罕默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兰经与教典都已陈旧了,应当代之以新的律条了,这种律条,先知就在他所写的圣经中告诉人们。他宣说,已经到了出现新先知——马赫底的时候了,新先知在大地上建立新制度、新公道与新幸福。但是掠得政权的哈基姆与乌拉马(亦即世俗的执政者与高级僧侣),凭借着可兰经与教典,不愿抛掉旧制度。按照巴布的教义,这便是大地上充满了

* 原载[苏]伊凡诺夫:《伊朗史纲》,李希泌、孙伟、汪德全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

不公道与倾轧的原因。

巴布在自称是新的先知而称他的《默示录》是新圣经之后，他宣教一切人们平等，妇女也包括在内。他断言：随着时代前进，他的教义将传遍全世界，但是在目前巴布教徒的神圣王国还只不过是伊朗的五个大省：阿塞拜疆、马赞得朗、波斯的伊拉克（中伊朗）、法尔斯与呼罗珊。在这一神圣王国上住的人只能是信奉巴布主义的人们。凡拒绝信奉《默示录》的，虽是外国人，也一并赶出巴布教徒的神圣国家，没收其财产，分给巴布教徒。接着还有一些关于保障个人权、私有权的指示，关于继承制度等等指示。

除了这些一般的原理以外，其中还有说得很模糊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幻想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无封建的压迫，人人一律平等而幸福。巴布提出了很多符合商人利益的极其具体的要求（欠债必还、严守商业通信的秘密、用法律规定高利贷的利息、举办良好邮政、统一币制、圣国的人民可出外经商等等）。

巴布的教义并不是始终如一地表达农民与手工业者劳动群众的利益。

在巴布教徒宣传的初期，1848年年中以前，巴布及其门徒并没直接向人民群众传教。他们企图将国王、宫廷侍臣、一些州长和乌拉马争取过来。没想到统治集团反过来惩办他们，不准传教。巴布本人在1847年被捕，起初被囚禁在马库要塞，后又囚禁在契利克要塞（乌尔米亚湖之西，离土伊交界处不远）。对巴布的信徒同样地查拿究办。

巴布信徒知道了自己在统治集团当中宣传已告失败，并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满，自发地团结在他们周围，才转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而且在巴布的信徒中出了一些比较接近于人民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出身农家的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他们青出于蓝，将他们导师的教义中的民主因素加以发展，远远走到他们导师的前面去了。

巴布教徒在宣传上的这一转变，当他们在沙赫鲁德市迤东的别达什特镇传教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1848年年中，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著名的巴布教徒女宣教者静观和其他一些巴布教徒皆聚集于此。在一连开了几天的别达什特巴布教徒会议上，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宣称新先知降临的时刻已经到来，旧的法律与制度、可兰经与教典都已失效，所以人们现在没有再履行自己旧的缴税和服役的义务（这些都是在以前，对自己老爷有利，他们所必须履行的义务）。更有进者，他声明：在将来的神圣王国中，所有高高在上的，亦即各封建主，将要剥夺他们的特权和权利，降到最微末的地位。他进而宣布私人所有制是剥夺别人的物权的，所以应予废除，一切财产应归公有，每人只得其中的一份。除此而外，在别达什特大会上的说教中，宣布男女平权与其他一些民主要求，比起巴布所宣布的更为坚决。

巴布教徒在别达什特传教，唤醒了周围农村的农民，他们都聚到别达什特来找传教士，因为他们说压迫与排挤人的王国已到末日，而所有的人行将平等与幸福的神圣王国即将到来。当时官厅震惊失措，从沙赫鲁德派来武装部队将巴布教徒赶散。巴布教徒从别达什特散到各州，宣扬他们的思想。

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率领弟子前往马赞得朗，在巴尔福鲁什市（现在的巴波尔）照旧宣传。

1848年9月，穆罕默德王逝世。穆罕默德王逝世之后，新王纳歇尔丁王在十月即位之前，在德黑兰和各省的官厅自相惊扰。呼罗珊、伊斯法罕、克尔曼、设拉子和伊斯得都纷纷起义，反对州长。马赞得朗的州长及其亲信都到德黑兰去了，求在新王之朝得保禄位，州里只剩下了些市县地方官长，

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

巴布教徒决定利用官厅自相惊扰的机会,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十月中,他们在巴尔福鲁什已有党徒约七百人,公开武装起来。和当地诸汗的部队小有接触之后,巴布教徒离开了巴尔福鲁什,驻扎在巴尔福鲁什东南约二十公里的赛赫·塔巴尔西陵墓附近的森林里(在塔拉尔河西岸)。

巴布教徒决定在这里长期住下,便在陵墓附近用砖坯修筑起堡垒,即向农民展开宣传。不久从四外的乡村,甚而从伊朗的其他各州聚会到巴布教徒这里来的约有二千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农民送给牲畜、粮食和其他材料,手工业者制造武器。在很大的八角形堡垒内筑起了木头房舍,外用芦苇遮掩。

巴布教徒的领导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和毛拉·胡赛因·波什鲁耶试图在这里废除私人所有制、财产公有与人群平等。于是宣布所有资财公有。为此派有一些巴布教徒专管分配事宜。巴布教徒都吃大锅饭。

当德黑兰获悉巴布教徒已在马赞得朗起义之后,新国王纳歇尔丁的首相密尔扎·达吉汗(阿密尔·尼扎姆)命令马赞得朗诸汗自行镇压这次起义。但是巴布教徒得有周围农民的支援,进行夜袭,击败诸汗的部队,把这些部队打得狼狈而逃。

由于巴布教徒节节胜利,而吓破了胆的很多马赞得朗的汗与僧侣都从城市或从自己的采邑逃亡山中去了。他们散布流言蜚语,硬说巴布教徒抢劫居民,实行公妻等等。

1848年底,国王派他的叔叔马赫底·古里·密尔扎率领王军(约二千人)从德黑兰进讨巴布教徒。但是,巴布教徒又来了一次夜袭,大败王军,王军抱头鼠窜而逃。

巴布教徒的宣传日广,其信徒日多。1849年2月,密尔扎·达吉汗告诉驻德黑兰俄国公使朵尔哥鲁基公爵说,据他看,此时伊朗全境巴布教徒已达十万人。^①他们已经在津章公开准备起义。

王室大为震惊。向赛赫·塔巴尔西陵墓加派军队,总共约有七千人。遂包围了巴布教徒的要塞,以大炮轰击。僧侣宣布对巴布教徒进行“圣战”。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军队屡遭失败。最后,巴布教徒和四外乡村断了联系,粮秣耗竭,要塞内的人没饭可吃。由于饥饿的结果,遂有由要塞改投王军大营去的。

尽管这样,1849年5月以前巴布教徒还是屡败王军,击退王军历次进攻,王军人数已增至万人。而要塞中的巴布教徒,此时还不足二百五十人。5月初,巴布教徒因马赫底·古里·密尔扎当着可兰经宣誓,答应保全他们的生命与自由之后,便停止抵抗。可是,当巴布教徒轻信诺言,放下了武器之后,王军却不守信义,将他们完全杀掉。巴布教徒的堡垒全被拆毁,甚至形迹不留,使人不致想起曾经有过巴布教徒起义的事情。

马赞得朗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巴布教徒在伊朗其他省市中的活动不但没停止,反而规模更大。巴布囚禁在契利克要塞,前来参拜的不仅是来自伊朗各省的,甚至有来自土耳其与印度的。在德黑兰,巴布教徒日多。驻德黑兰俄国公使朵尔哥鲁基于1850年2月12日向给内塞罗得报告说:“在德黑兰到处都是这种危险教派信徒,他们是不承认民事法规的,宣传说凡不信奉巴布教义的人的财产将被分与他人。”^②1850年2月,官厅在德黑兰破获了巴布教徒的秘密组织,这一秘密组织为了报复

①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来往公文》,1849年,第177日,第32~33页。

②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往来公文》,1850年,第133日,第103~105页。

在马赞得朗惨害巴布教徒的仇恨,他们意图刺杀伊朗国王、阿密尔·尼扎姆和高级僧侣人物,夺取政权。伊朗国王政权逮捕了这一秘密组织的巴布教徒约四十人。其中有七人因不肯履行阿密尔·尼扎姆的当众咒骂巴布,并背叛巴布教义的要求,遂在市内广场被处死刑。

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在津章起义。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是津章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有一个参加巴布教徒这次起义的密尔扎·扎尼,他在论巴布教徒起义《努克达特·卡沃》(Hyk-tat-Дль-Каф)一书中写道:早在1847年在津章地区已有数千农民是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徒了。^①到了1850年春天的时候,在津章及其邻近地区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徒已达一万五千人,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城市里势力很大。奉行他的指示的,不是巴布教的信徒,而是许多津章的居民。巴布教徒公开准备斗争:储备火药、黑铅和其他军用品。

1850年5月,州长下令逮捕了一个巴布教徒。这便是发动起义的口实。巴布教徒打开了城中的监狱,救出所有的狱囚。后来他们占领了城中的要塞。城市分成了两部分,巴布教徒占领的是东边一大部分,西边的一部分还在他们的敌人手里。诸汗和财主都从巴布教徒占领的城市东部地区逃出。双方都在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和工事。

手工业者和农民是起义的主要群众。除此而外,有很多小商人和低级僧侣积极参加起义。低级僧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代表人物起着领导作用。商人哈只·阿卜杜拉、铁匠卡节姆和面包师哈只·阿卜杜拉都是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最亲近的助手。手工业者为起义者准备武器。积极参加起义的还有妇女,她们在街垒上和男子一样英勇。起义者有一处工事,保卫此处工事的巴布教徒的部队就是由妇女指挥的。

巴布教徒的领袖宣称,他们在建立一个新的、拥有公平制度的将垂诸永久的幸福王国。他们又称,一切巴布教徒都是一个公社中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一如在赛赫·塔巴尔西陵墓那次起义一样,一切财产宣布公有。

自五月底起,开始从德黑兰派出军队,前往津章镇压起义。可是开来的军队屡次进攻,都被巴布教徒击退,伊朗国王的军队受了惨重的损失。

在1850年,巴布教徒起义反对官厅的地点不止津章一处,1850年初在伊斯得爆发了起义,领导者为巴布教徒赛义德·雅西·达拉比。这次起义不久便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到了1850年6月的时候巴布教徒又在尼里士(法尔斯)发动起义。为了防止巴布教徒运动继续发展,首相密尔扎·达吉汗在伊朗国王面前主张将巴布处死,在他上国王的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巴布活一天,他的信徒的起义就一天不停,且能变为全国的革命,结果恺加王朝将被推翻。

1850年7月初,国王下令将巴布由契利克要塞押解到大不里士,即在大不里士枪决了。

巴布虽已处死,并没能使巴布教徒的运动停止下来,津章的巴布教徒继续顽强抵抗。调动了很大的兵力(约兵士三万人)带着大炮去打他们,炮队向市内巴布教徒占领的那一部分大肆轰击。但是尽管炮轰,丧亡惨重,而且饥饿无食,巴布教徒还继续抵抗达数月之久,一直到了1850年12月底,王军才将津章巴布教徒的起义镇压了下去。国王的将领已经答应保全巴布教徒的性命和自由,但是后来等到巴布教徒停止抵抗,缴了械以后,却令兵士把他们尽数杀害了。

1851年初,巴布教徒又在津章活动起来,并准备再发动起义,反对政府。但是他们的力量由于

^① E. G. 布朗编辑:《基塔布·努克达特·卡沃》,来顿—伦敦1910年版,第126页。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受了挫折。因此官厅很快地便将巴布教徒在津章再度发动的运动镇压下去。

1850年6月,巴布教徒在尼里士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第三次起义。到了这个时候,在尼里士及其邻州的居民无不咬牙切齿地痛恨尼里士州长的贪污和对于居民的残暴压迫和横行霸道。1850年6月,巴布的门徒赛义德·雅西·达拉比在信徒数百人伴随之下来到了尼里士。这一年的年初,在伊斯得举行巴布教徒的起义,即是由赛义德·雅西·达拉比领导的。赛义德·雅西及其信徒开始在清真寺内宣传巴布教的思想。没有几天,城内及四外乡村的大量居民都投向他们来了。在赛义德·雅西的周围聚有好几千人。州长和其他地方当局在和巴布教徒小有接触之后,便都逃出城去。巴布教徒遂占领了城外的一处旧要塞。

不久,从设拉子派来军队进剿巴布教徒。军队到了尼里士,将要塞包围,开炮轰击。巴布教徒屡出袭击,均被王军击回,巴布教徒伤亡很重。巴布教徒的队伍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一见初战不利,遂不免动摇,四散奔逃。手工业者本是巴布教徒历次起义的中坚力量,但在尼里士巴布教徒中的手工业者却很少。王军的指挥部在尼里士又采用了在马赞得朗与津章消灭巴布教徒的得意方法,欺骗他们,答应赛义德·雅西保全他的生命与安全,劝赛义德·雅西从要塞出来。当赛义德·雅西出来之后,王军却攻入要塞将其中的巴布教徒杀尽,一个不留。赛义德·雅西一同被害。州长与诸汗疯狂地处治四外乡村同情过和帮助过巴布教徒的居民。

因为这样处治人民,过了些时,农民又在尼里士地区第二次起义。农民一家一家地抛弃了自己的乡村,逃入尼里士附近的山中。政府调动大军,携有大炮,会同当地诸汗的部队进剿起义者。但是巴布教徒,不论是男的或女的都抱着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从事防御。他们从山上下来,出其不意地夜袭王军,把轰击他们的大炮给破坏了。有时他们抢到的大炮还是完好无缺的。他们把抢来的大炮运到山中,用来射击王军。有一次夜袭,巴布教徒竟潜入尼里士,杀了尼里士的州长。

起义者坚守着自己在山地的工事历时很久。兵士中间有很多同情巴布教徒的,不肯攻打他们。这才派了达拉布·萨普纳特与其他地区的好战的山地部落去攻打巴布教徒。进攻巴布教徒的军队与部队,共达一万人以上。最后,起义者陷于孤立了,他们和附近乡村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的弹药都用完了。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求饶,还是奋不顾身地从事防御。他们有很多人在白刃战中阵亡了,其余的做了俘虏。

镇压这次起义比镇压第一次尼里士起义还残酷。把巴布教徒活生生地烧死,把他们捆到炮口上开炮射击。一批巴布教徒,其中很多是妇孺,被关在一个山洞里活活烧死了。很多妇女和小孩被卖为奴隶。一部分俘虏送至设拉子折磨拷打,终于至死。

尼里士的第二次起义是农民与手工业者在巴布教徒领导下的最后一次群众性的发动。此后,巴布教徒的运动便失去了群众性。农民与手工业者逐渐脱离了巴布教徒。1852年春,巴布教徒又企图在巴尔福鲁什、津章与阿塞拜疆发动,但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不久就被官厅镇压下去了。

巴布教的传教士主要是些低级僧侣与商人,他们失去了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支持之后,遂转而采用恐怖手段。1852年8月,他们谋刺纳歇尔丁王未遂,结果国王仅受了很轻微的枪伤。凶手当场被捕。后来在德黑兰逮捕了同情巴布教徒知名的人数十名。差不多全被判处死刑。

国王害怕巴布教徒报复,企图将镇压巴布教徒的责任转嫁给整个统治上层人物,下令将判处死刑的巴布教徒分配给各宫廷侍臣、各部大臣、各乌拉马与其他权势煊赫的人物。让他们亲自处治巴布教徒。在处死巴布教徒以前,百般地折磨与拷打。有一些巴布教徒脚上用钉子钉上了马掌,有一

些则先用刀割,然后往创口里插上燃着的蜡烛和其他种种残毒手段。经过这样的收拾以后才把他们枪决,或用石头砸死,或用乱刀砍死。在德黑兰镇压了巴布教徒以后,紧接着在伊朗全国开始查究巴布教徒,并把他们处以死刑。

巴布教徒的起义是民主主义的、反封建的起义,客观上也是反外国资本奴役伊朗的。这种起义是由于农民与封建主间的矛盾尖锐化才有可能的,参加起义的以农民为多。起义具有农民运动而非工人阶级领导的特点(地方性、组织性不强、宗教思想等等)。根据这一切便可认定巴布教徒的起义基本上是农民起义,尽管在起义中除了农民以外还有其他阶层的居民。

因为农民由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发展极差,不能从自己当中推出运动的领导者,所以起义才由低级僧侣和商人的代表人物来领导。

在巴布教徒运动中已有了两种派别的萌芽:一种是由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为代表的民主的、人民的派别,一般是力图消灭封建制度与剥削的。而第二种则是反映着商人利益的派别,个别地主也接近于商人,这一派的目的仅在于改革现有的制度。到了后来,当伊朗社会经济发展与阶级分化达到了最高阶段的时候,才形成了各个独立的、彼此不同的两个派别——民主主义派与自由主义派(1905~1911年革命)。

在十九世纪中叶伊朗的历史条件下,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是一种乌托邦的要求。但是在这一要求后面却寓有民主革命的意图——就是消灭封建主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将这些资料平均分配给农民。巴布教徒的起义,其进步意义在于他们是破坏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为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扫清道路的。

由于伊朗社会政治的落后,而且又有浓厚的中世纪残余滓渣,所以巴布教徒的起义具有很多中世纪人民运动的特点——如宗教形式、财产公有的口号、幸福天国的幻想等等都是。官方的伊斯兰教寺院阐扬的是封建制度。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时都要引证可兰经与教典。对于身受封建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宗教是一种合理的和最易于接受的一种思想形态。在这个时候要反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就必须揭去神圣的外皮”^①(恩格斯这些话是对德国农民战争说的,对于巴布教徒的起义,也完全可用)。所以巴布教徒反对封建制度的起义也采用了宗教的形式,马克思曾说,东方的所有革命运动都是采用的宗教形式,这不是偶然的^②。

伊朗巴布教徒的起义是在19世纪中叶席卷东方各国(印度的西帕伊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的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转而又是19世纪中叶笼罩着西方和东方的革命危机的一部分。东方的革命运动是由于封建制度矛盾的尖锐化的结果,由于外国资本侵入东方各国而矛盾加剧的结果。

巴布教徒的自发性与组织性不强,它的地方性,各省起义缺乏联系,都是巴布教徒起义失败的基本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一种能清楚地理解运动的目的和任务,并能给斗争指出正确方向的领导核心。巴布教徒起义的命运是证实斯大林同志所说: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可能取得胜利”^③的很多范例之一。

19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之渗入伊朗,和它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却愈来愈加紧了。大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2卷,第2分册,第360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0页。

部分伊朗商人全成了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与中间人,换言之就是变成买办了。国家的独立,和列强势力作斗争以及现行制度的根本改变,这对于买办说来是格格不入的。巴布的一个门徒——比哈乌拉是这部分商人的思想家。他把巴布主义学说中的全部革命民主因素都给抛弃了。他坚决反对革命与革命的斗争方法。他在给国王的奏议中,千方百计地证明他和他的信徒——比哈分子才是国王的忠顺臣民,他斥责一切反对当局的言论。他的学说和政治并无任何关系,他所抱的目的仅在“净心诚意”等等。他宣称,只有和平宣传才是比哈派的武器,而不用强迫作法。比哈派坚决地保护私人所有制与社会上人类的不平等。比哈乌拉因为代表买办的利益,反对伊朗民族独立。他宣称:谁也不该以爱自己的祖国而自豪,所应爱者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全世界。因此,比哈分子主张消灭国界,用世界语组织全世界的统一政府。他们宣扬宗教与科学有统一的必要性,以及其他反动思想。

比哈主义是买办的思想,它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背叛民族独立的斗争事业的,背叛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的事业的。比哈主义和它的世界主义思想以前是,到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对伊朗政策的武器。

巴布教徒一再起义,乃伊朗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明证。较有远见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已经理解改变现况的必要性。他们看到如不改弦更张,则农民与城市人民新发动的危险依然存在,伊朗势将日愈沦为欧洲列强的附属国家。因此在统治阶级中出来了不多的一批人,认为国家有进行改革的必要。对这种改革特别关心的是和市场与商业相结合而不属于封建贵族以内的那些地主。

纳歇尔丁王的首相密尔扎·达吉汗就是这部分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照他的出身,并不是封建贵族。他的父亲起初是一个厨师,后来做到了穆罕默德王首相的管家。

在阿·斯·格利包耶道夫被害之后,密尔扎·达吉曾任密尔扎·科斯洛埃斯代表团秘书到达彼得堡。一直到了1843年,国王才赐以汗的称号。后来密尔扎·达吉汗任伊朗代表团团员参加过解决伊朗土耳其边境问题的爱尔捷鲁姆会议的工作。在密尔扎·达吉汗驻在土耳其的时候,他考察了当时土耳其政府变法的情形,并得出一个结论:伊朗图强也非变法不可。他从土耳其回国之后,被任为阿捷拜疆的大臣,而阿捷拜疆的统治者是年轻的纳歇尔丁,当时还是王位的继承人。穆罕默德王死后,密尔扎·达吉汗与纳歇尔丁王一起到了大不里士,达吉汗被任为首相兼三军司令,因此赐予封号为阿密尔·尼扎姆。^①

在密尔扎·达吉汗担任首相的期内,他想实行改革,以巩固中央政府的政权,限制列强的势力,主要是限制英国的势力。阿密尔·尼扎姆首先着手改革的是军队。他严禁部队及其指挥官的无纪律现象及懈怠行为、严禁盗窃用以支付士兵薪饷的公款等等。

他力图缓和农民的愤怒与不平,乃将诸汗对农民的剥削加以限制,定出一种固定的剥削范围。他制定了计划,规定了农民应缴诸汗的贡赋的数额,他想取消对农民的过份压榨,以免引起农民的起义,而危及整个封建制度。这一方法和密尔扎·达吉汗的其他改革方案,其目的同是为了巩固中央政府的政权,这对于镇服人民起义,镇服不听命令的诸汗的叛变,以及抵抗列强对伊朗日益加紧的压迫,是有必要的。

在伊朗所有的政治家,密尔扎·达吉汗是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加强势力的一个人。他企图不让列强,首先是英国奴役伊朗,并力图恢复它在国内外事务上的真正独立自主。俄国公使朵尔哥鲁

^① 阿密尔·尼扎姆爵号,按字释就是“裁政公爵”或“管军的公爵”。

基在 1849 年 10 月 10 日曾向内赛罗得报告说,因呼罗珊的大封建主萨拉尔起义,达吉汗深惧英国公开干涉伊朗的内政。英国人利用反动诸汗的分立心理,一贯地进行削弱伊朗的政策。1846 年萨拉尔汗受英国人唆使和支持在呼罗珊叛变,此次叛变直到 1850 年才镇压下去。据朵尔哥鲁基说,阿密尔·尼扎姆曾经说过,我们既不愿呼罗珊成为第二埃及,也不愿让他(指英国人而言)有任何机会干涉波斯的内政。^①

^① 本文年份前后不一,有矛盾之处。但为保留资料原始性,未加改动。——编者注